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8 年第 8 期 · 总第 704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 1 从马克龙访德看欧盟经济治理改革中的德法之争（一）
马克龙的雄心与德国人的疑虑
- 2 从马克龙访德看欧盟经济治理改革中的德法之争（二）
欧元区的非对称经济治理机制与乏人喝彩的“欧洲经济政府”
- 3 德美分歧明显，跨大西洋关系进入不确定期
——点评默克尔第二次登门拜会特朗普
- 4 德国有了一个新的反犹问题

1 从马克龙访德看欧盟经济治理改革中的德法之争（一）

马克龙的雄心与德国人的疑虑

马克龙之急与默克尔之缓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4月19日对柏林进行了访问。本次德法会晤的主题是欧盟改革，即如何使欧盟在经济上更稳定、外交上更强大、内部更团结。来访的马克龙拿出的是雄心勃勃以改革“救世”的姿态，而刚刚再次掌权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毫无悬念地以保守姿态应对；马克龙想要投资，默克尔捂紧口袋。于是攻守对抗成为德法会晤的主旋律。

无疑，默克尔与马克龙的原则性目标是一致的。推进欧洲一体化是马克龙总统生涯的基石，他也不断在重要讲话中阐述维新欧盟的愿景。英国脱欧，特朗普不时兴风作浪，欧盟以外种种不利因素频现，在这样的状况下，默克尔自然也是希望欧盟日益强大，并非常看重德法两国在欧盟的轴心作用以及与马克龙的合作。本届德国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的主题就是“欧洲重新出发”（Ein neuer Aufbruch für Europa）。德国和法国都真心希望欧洲强大。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去年6月各成员国首脑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首脑峰会上决定推行的欧盟改革，只有德法两国步调一致才可能实行。但即便有深刻的合作基础，一旦涉及具体的改革措施，德法之间便一再出现巨大分歧。

马克龙的欧盟改革计划很明确：要让欧盟尽可能强大，为此须投入大量资金。他的计划包括建立更完善的欧盟对外边防，并逐步形成共同的难民和外交政策，但核心想法始终是增加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投资，而且应当实现由欧盟自己的财政进行投资，并为此设立欧盟财长一职。此外，引入共同存款保险，完善银行联盟以防范危机，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对马克龙的改革计划，默克尔态度保守。她也主张形成欧盟共同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并增加必要的开支，但对马克龙计划的其余部分，她均持怀疑态度。默克尔所在的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联盟党（基民盟及基社盟）党团在马克龙到访前公布了一份文件，对马克龙在欧盟经济治理领域的改革主张表达了强烈的抵制。党团的意见虽然对默克尔与马克龙的商谈不具约束力，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默克尔面对马克龙做出额外让步，便会令自己在党内遇到麻烦。默克尔在基民盟党内的权威性已大幅下降，大家早已开始议论起“后默克尔时代”。在本届联邦议院的709个席位中，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组阁后形成的黑红大联盟占399席，距表决通过所需的355票只有44席的优势，作为执政党不得不较以往更重视自己内部的不同声音。而且事实上，这种抵制态度背后的忧虑即便不是由联盟党提出，也会由反对党即德国选择党和自民党在政治辩论中表达出来。

社民党持何态度？当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是党主席又是外长指定人选时，欧洲曾是社民党最重要的政治主题。现在虽然名义上也还是这样，但刚刚换帅的社民党在欧盟改革问题上尚未有明确表态。而在欧盟财经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德国副总理兼财长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社民党）态度保守，与其前任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基民盟）的立场相似。

可以说，对马克龙在欧盟经济治理领域的改革计划，德国左、中、右所有主流党派的立场竟空前一致——“保守”“抵制”。那么，德国人究竟有何疑虑？

德国人的疑虑与德国方案

对马克龙扩大投资的主张，批评者指出：欧盟目前可用于投资的钱并不算少。每年仅“凝聚

政策”一项就有 3500 亿欧元的预算，用于缩小地区间差异。欧盟委员会还通过所谓的“容克计划”为私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提供资助，总金额高达 5000 亿欧元。马克龙必须解释，为何在他看来还需要额外投资。

马克龙有关设置专门预算以防经济危机的想法也需要进一步澄清，如欧洲失业保险：所有成员国均缴纳资金，必要时为危机国家的雇员提供资金支持。危机预算这个想法的吸引力在于：危机发生时无需进行艰苦谈判即可实现各个方向的转移支付。但德国的批评意见认为，欧洲失业保险很可能使德国不得不为其他国家的失业买单。

那些从长远看可能增加德国负担的改革措施也在德国遭遇巨大阻力，尤其是欧洲银行联盟。建立银行联盟的想法也是源于最近一次的危机。人们看到，个别成员国的金融机构有可能为整个欧盟带来问题。为此，欧盟已经引入银行的共同监管和单一清算机制这两大支柱。银行联盟的第三大支柱是尚处讨论阶段的共同存款保险。共同存款保险的想法获得不少专家的支持，但在德国也引发忧虑，人们担心存款保险会把银行的存量债务普遍化，比如意大利金融机构的账面上就还有数十亿欧元的无担保贷款。德国政府认为，要谈共同存款保险就必须先消除这些债务。因此，默克尔在与马克龙的会晤中表示，引入存款保险将是在“遥远的未来”。

马克龙有关设立欧盟财长的设想也使德国人忧心忡忡。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最近一次的危机中，人们时不时会感觉到，欧元区财长们组成了一个民主性严重缺失的机构，越过民族国家的民主立法机制为整个欧洲做出重大决定。

当然，面对马克龙一上任就以“重建欧洲”为口号在欧洲发起的魅力攻势，德国人也不能毫无作为，必须做出自己的回应。去年，时任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拿出了德国的改革方案：将欧洲稳定机制（ESM）转化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WF）。朔伊布勒自 2009 年担任德国财长起就扮演了应对欧元危机主要操盘手的角色，是强硬的财政纪律捍卫者。德国的 EWF 方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扩大资金，增强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第二是优化职能，形成一套更有效的债务重组机制，对危机国家实施更有效的救助；第三是机构转型，将目前 ESM 非政府金融机构的身份转变为欧盟机构，赋予其监督成员国执行财政纪律和对成员国的经济风险进行观测、预警的权能。

很明显，德国想要打造的“欧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一个高效的主权债务重组机构和强有力的财政纪律监管机构。德国人主张加强财政纪律管束，防止成员国因违规而滑出正轨，进而引发危机，并要求危机国家通过整顿债务和财政纪律走出困境。马克龙改革计划的核心是希望通过确立欧盟统一财政，设立欧盟财长，以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打破成员国之间的转移支付壁垒，预防和缓解危机，最终促进各成员国经济均衡发展，推动欧盟的一体化。

2 从马克龙访德看欧盟经济治理改革中的德法之争（二）

欧元区的非对称经济治理机制与乏人喝彩的“欧洲经济政府”

欧元区的非对称经济治理机制

“货币主义”对“经济主义”，“严格财政纪律”对“欧洲经济政府”，德法之间在欧盟经济治理思路上的巨大差异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立之初就已存在。为何说欧元区现行的经济治理机制带有浓重的德国色彩？欧元区有又为何会采用这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非对称的治理机制？不妨来简略回顾一下历史。

建立平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管理体系，这是经典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建立欧洲经货联

盟的最初构想也是照此设计。1970年的《维尔纳报告》(Werner Report)和1977年的《麦克杜格尔报告》(MacDougall Report)分别对欧洲经济政府和欧洲公共财政提出了具体建议。但欧共体最终决定,首先致力于成员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汇率管理,暂时搁置经济政策的统一协调。

欧共体的这一决策与当时经济政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滞胀,表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关系(即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被弱化,强调财政平衡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这两大经济政策原则开始占据主导地位。80年代,欧共体主要成员国在经济政策上都发生了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的范式转变,而后者与德国经济制度的秩序自由主义传统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德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和表率作用使欧盟经济治理机制带上浓重的德国色彩:一方面,由于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马克的良好声誉,德国在欧洲货币联盟筹建阶段的谈判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德国在历史上的教训和经验既印证了币值稳定这个政策目标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德国央行货币政策模式在欧洲的号召力。

可以说,欧洲共同体的经济治理机制是一种“欧洲化”了的德国模式,其核心是:中央银行拥有绝对的独立性,并将维护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

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德洛尔计划》放弃了欧洲中央银行与欧洲经济政府的平行机制,在机构上只设计了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财政政策的协调弱化为对成员国预算的纪律约束,从而形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治理机制。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2月签署)随后在法律上把这种机制确定下来。这种非对称的经济治理机制从诞生之初就不被学界看好,随着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引爆欧元危机,欧元区的经济治理机制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备受质疑和诟病。

“改革”已然成为共识,但为何在探索和拉锯了十年之后,仍未形成明确的路线?

有关欧元危机的原因,基本已形成共识:随着欧元的启动,各成员国之间的名义利率水平迅速趋同,这在欧元区创建之前就已经被预见到,但不幸的是,欧元区各成员国的通胀水平却并未如原先预料的那样随之趋同。在欧元区名义利率相同的情况下,通胀率越高的国家,实际利率越低。某些危机国家在危机爆发前的实际利率甚至为负。欧元引入后,这些低利率国家信贷需求激增,导致境外资本大量流入。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在房地产和投资领域催生出泡沫。在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波及下,信贷泡沫破裂并引发连锁反应,国家不得不通过银行救援行动和经济景气措施来“接手”大部分的私人负债。这迅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影响到国家的偿债能力和信用评级,致使国债利率飙升,几乎阻断了其在金融市场上再融资的可能,这些国家因此深陷债务危机,甚至面临国家破产。这说明,欧元区成员国的通胀水平差异是导致欧元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

可见,虽然引爆欧元危机的是主权债务危机,但财政问题只是表征,债务危机背后更为深刻的问题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因工资水平、通胀水平差异而在国际竞争力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此出现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因此归根结底,欧元区要若想最终摆脱危机的阴影,就必须最终实现各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

欧元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欧元区,包括修订《稳定与增长公约》、订立《财政契约》、设立金融救助机制、强化监督程序以及成立银行联盟等。这些措施是在德国的主导下制定的,它们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强调了宏观经济的均衡性,但除了金融救助,其具体措施仍然是规制性的,并没有撼动欧元区的不对称经济治理机制。

乏人喝彩的“欧洲经济政府”和法国的自相矛盾

试图对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是法国人。早在 2008 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在欧洲议会的发言中指出，由于当前欧元区某些国家的债务危机，16 个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在欧盟层面成立一个拥有自己的总秘书处的经济政府（gouvernement économique），“如果没有一个界定清晰的经济政府，欧元区将难以为继”。先是萨科齐，现在又是马克龙，为什么法国人如此偏爱“欧洲经济政府”方案？是为了向德国模式叫板吗？而这个看似妥当的改革建议为何未能得到响应和践行？

战后法国的经济体制，是典型的现代“计划型”混合经济体制，行政管理权和经济调控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法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有限的，货币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法国财政部手中。拿破仑有一句常被引用名言：“它（法兰西银行）必须独立，但也不能太独立。”

秉承这样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法国虽然在政治上赞同欧洲一体化，主张多极世界，但在经济上并不赞同当前欧洲货币联盟的治理模式。在法国看来，对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两个目标应当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明确的政策，应当通过政治性的财政政策对目前完全自治的、纯技术性的货币政策进行补充和制衡，而这种补充和制衡的机制就是“欧洲经济政府”。虽然法国不断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平行关系，但却始终未能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是因为法国在欧盟经济治理方面并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它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

法国一方面主张在欧洲层面确立中央集权式的机制，但另一方面却又力图保留国家层面的权力。具体而言，法国希望在财政政策方面建立一个能够与欧洲中央银行相互制衡的机构，这个机构是集中管理而非协商“治理”的。这必将要求各成员国将财政政策方面的主权让渡给这个新成立的超国家机构，而这一点恰恰又违背了法国国家利益至上的戴高乐主义的政治传统。欧洲层面的中央集权与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戴高乐主义这两种政治传统在法国同样影响深远。在民族国家层面，它们是协调一致的，但一旦涉及欧盟层面，它们却背道而驰。正是这种内生的矛盾使法国在欧盟经济治理模式问题上始终处于一种“反对派”的立场和地位，它提出的批评有合理性，但却无法形成富有可行性的实际方案。

而且，欧盟经济治理本身存在民主合法性方面的薄弱环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从本质而言都是“再分配政策”，它们有益于某些特定的行业、社会群体，同时也必然会直接或间接损害另一些行业和群体的利益。在具备完整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中，这种具有“零和”性质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在民主性上并无瑕疵：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向议会和选民承担政治责任，而选民通过选举实现对政策的决定和修正。但欧盟层面并不存在这样完备的民主体制，因此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政治决策都不具备充分的民主合法性。

在实践中，除德国之外的欧盟其他成员国也几乎都不赞同法国的主张，因为它们担心欧洲经济政府会成为大国的工具，从而使小国彻底丧失在经济政策上的发言权。

欧盟改革前景难言乐观

由此可以看出，欧盟现行经济治理机制虽然被公认存在瑕疵，但至今未实施根本性改革，而是“修修补补”，加强规制性，用防御性的保守措施应对危机，这的确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从实际情况来看，欧盟所采取的规制和严厉的紧缩措施虽然显得僵硬，难以激发危机国家的经济增长活力，但至少较为明显地改善了它们的财政和国际收支数据，并在一定程度上倒逼这些国家进行内政改革。另外，对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在救助中的出资国而言，勒令受援助国紧缩不存在道德风险，是国内政治接受度最高的方案。

欧盟改革势在必行，德法合作方能推动改革，这是所有人的共识。但由于根本性的理念差异和利益分歧，马克龙雄心勃勃的欧盟改革计划很难得到德国的共鸣，尤其是经济治理领域几乎所有的具体方案都已在德国遇阻。加之德法两国内政形势均很复杂，欧盟范围内民粹主义蠢蠢欲动，

随时可能伺机搅局，欧盟改革前路漫漫，前景并不容乐观。

3 德美分歧明显，跨大西洋关系进入不不确定期

——一点评默克尔第二次登门拜会特朗普

无论世界怎么看待美国，无论我们怎么看待特朗普，一个大家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美国以及特朗普仍旧是游戏规则和议程制定者，哪怕这个游戏规则和议程是破坏性的、颠覆性的、违背已有承诺的和另起炉灶的。就在过去的这一周，欧盟的两驾马车轮流上阵，希望在华盛顿为跨大西洋关系、世界贸易和世界和平等议题讨得积极的信号。然而欧洲人本来就未抱太大希望的盘算恐怕要落空。

特朗普不可不谓给欧洲人面子，法国总统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 15 个月以来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特朗普也颇懂得“象征政治”的重要性，甚至和马克龙还表演了私人的亲密秀：特朗普亲手为马克龙拂去肩头的头皮屑，据说去年年底还给马克龙寄去了有关两人关系的剪报，附上了手写的“这是真的，埃马努埃尔（注：马克龙的名字），我爱你！”字样。然而，这两位均以传统秩序挑战者身份登上总统位置的政治家能够为世界政治所贡献的恐怕也仅限于这些花边画面和新闻。紧随着这些画面之后的，是马克龙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把特朗普的关键政策全部批评了一遍，无论是在贸易政策、气候政策还是在伊朗核协议方面。欧美目前对于世界格局的理解乃至价值观的分歧处处可见。在结束正式访问后，马克龙向媒体透露，他相信特朗普将退出伊朗核协议。因此，法国总统的华盛顿之行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

4 月 27 日，默克尔第二次登门拜访特朗普，这是一次工作访问。德美两国媒体对这次访问做出了最低限度的期待：至少特朗普不会像去年两人首次见面时有意无意间拒绝和默克尔握手吧？至少特朗普不会再因为德国的高额贸易顺差而直接称德国人“坏，非常坏”吧？德国代表团显然也是带着“底线期待”前往华盛顿的，因为眼前的日程压力与特朗普近期的态度不容人乐观：5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将决定是否延长对来自欧盟国家的钢铝实施关税豁免，欧美真将迎来贸易战吗？5 月 12 日，特朗普设下的对伊朗的制裁豁免延长期限将至，他真将宣布美国退出当年由德国大力参与斡旋的伊朗核协议，让中东政局再次陷入不可知的动荡吗？

性格带有典型北德意志内敛、冷淡和距离感的默克尔被认为与特朗普天然地不属于一类人，不过默克尔为这次会面也颇花了一番心思：她带来了一幅 1705 年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地区的铜蚀地图作为私人礼物，因为特朗普的祖上来自这个地区。关于美国总统的德意志血缘的闲聊是否能够拉近两人的距离？虽然特朗普也努力做出和谐的样子，不时称赞“安格拉”（注：默克尔的名字）做得“棒”，但是我们也看到，一场二十分钟的会谈、共同进餐、共同参加记者招待会——其中特朗普就美国内政自说自话长达七分钟——之后，默克尔从特朗普那里得到的最明确答复就是“我们走着看吧”。这意味着双方的在有争议的议题方面达成的协议为：零。

对于德国政府和舆论而言，这个局面虽在意料之中，但无疑也令人沮丧。大家不无意外地发现，一向以情绪化、选择性接受事实和“后真相”著称的特朗普如今异常坚守自己的立场，其中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欧美能否避免贸易战？

希望不是没有，但是渺茫。至少迄今为止特朗普没有就继续延长欧盟钢铝的关税豁免做出哪怕是模棱两可的表态。在特朗普的世界里，全世界都通过自由贸易——尤其是 WTO 框架下的自

由贸易——“不公平地”对待美国，所以美国不再需要多边的贸易协议约束自己、让利于人，而应该回到双边贸易协定的老路。在这个话题上，德国实际没有任能够让特朗普回心转意的新牌可打。事实上，德国对美国的贸易出超从 2016 年的 489 亿欧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05 亿欧元，美国对欧盟的整体贸易赤字高达 1510 亿美元。虽然默克尔表示能够理解特朗普关于美国贸易赤字的立场，但是也指出德国在美国有大量的直接投资——这种观点估计很难被习惯于计算直观得失的特朗普所理解和接受。也许，欧洲人不久就要以牙还牙，美国人必须要为向欧洲市场出口波本威士忌、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和正宗的列维牛仔裤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关税。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还是马克龙以及默克尔，都在面对欧美贸易争端表态时强调“我们也希望有公平的贸易”。这一方面是提醒特朗普应该遵守自己参与制定的贸易规则，另一方面也有“指桑骂槐”的言外之意，即提醒特朗普，德美或者欧美在贸易争端中的共同敌人也许应该是施行所谓“不公平贸易”的中国、欧美都受到了中国的“不公平对待”、大西洋两岸应该联手要求中国提供“对等”待遇云云。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和智库在默克尔访美之间发出了相当数量的类似论调，呼吁欧美组成共同狙击中国的“联合阵线”。这当然可以激起一小撮“冷战战士”对于往日共同峥嵘岁月的美好回忆，然而在对德国经济、德国的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哪怕仅有不全面了解的人眼中均属无稽之谈。

德国、欧洲对于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的坚持，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路线之间，在特朗普所剩的三年任期内定会发生更多的冲突。

美国会退出伊朗核协议吗？

非常有可能。特朗普基本否认前任奥巴马所参与的一切政治、经济多边协议，伊朗核协议在他看来就是与德黑兰“嗜血政权”的媾和。伊朗核问题六国——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与伊朗在 2015 年就后者核开发利用问题达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以履行协议换取国际社会的制裁，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也随之缓和。然而特朗普声称伊核协议既“可笑”又“愚蠢”，坚持要以增添附件协议的形式防止德黑兰获得制造核弹的能力。为此，美国不惜以重启制裁作为威胁，核协议岌岌可危。

为了避免刺激伊朗——叙利亚内战和难民问题、也门内战、巴以冲突等问题的解决都不能离开伊朗——从而引发更多欧洲门前的国际争端，同时又为了挽救维持现有局面的核协议，法国和德国竭尽所能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寻求平衡。马克龙和默克尔在基本肯定伊朗核协议的同时，尽量朝特朗普的要求方向统一口径，即承认协议并非“完美”，同时警告抛弃该协议可能会带来的灾难性风险。马克龙在访问结束后附议美国，同意为对伊核协议增添内容而重新谈判，比如短期内排除伊朗的核活动，长期也应该约束伊朗非核的导弹项目等。这一态度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弹，称不排除重启受约束的核项目。默克尔和特朗普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坦率承认双方未能就这一问题消除意见的分歧。

德国的国防开支能令美国人满意吗？

几乎不可能。特朗普就职后直观的经济账包括了对美国不公平的军费开支。在他看来，北约内各成员国出资不对称，不少欧洲盟友把安全防务的负担留给了美国，省下了应该自己负担的军费，这就是赤裸裸地占美国的便宜。这其中，他对于欧盟第一经济强国——德国——的国防支出长期低迷公开表达不满。

按照不具约束力的愿景，德国的国防支出应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虽然德国政府努力提高预算，比如在新任财政部长朔尔茨 (Olaf Scholz) 计划于下周三公布的 2018 财政预算案中，

德国的国防预算将从眼下的 390 亿欧元逐步增长到 2021 年的 440 亿欧元，但是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还会不升反降，几乎不会超过 1.3%。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 27 日刚上任就飞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家外长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北约首先必须解决内部“不公平”的财政分配问题。据一位美国外交官透露，美国人在行前仔细地研究了德国提供给北约的数字。而在会上，蓬佩奥用一个明明白白的“没有”回答了德国有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以达到国防开支目标的问题。

德国在一波三折组建“大联合”政府之后，社会民主党执掌财政部，国防预算方面很难有大幅提升的空间。短期内增加军事支出，在德国缺乏内政基础和社会共识。虽然默克尔总理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会努力增加国防支出，但是德美在这个问题上目标差距之大，使得化解矛盾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许，马克龙外交顾问一番自我打气的話多多少少反映了欧洲人面对特朗普时的无奈：“我们无法改变特朗普的信念和获胜的竞选纲领，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努力，以便他调整自己的决定；或者我们至少共同努力，以减弱他的决定造成的后果——比如在气候变化方面。”特朗普对于既往规则的蔑视，以及特朗普政府成员的高度流动性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令这一点也陷入不可知。大西洋两岸，看来要为即将到来的风波乃至风暴做好准备。

4 德国有了一个新的反犹问题

四月份的德国社会突然不平静了起来，一个老话题重新回到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核心，甚至连默克尔也出面表态，事关德国社会的反犹问题。

4 月 12 日适逢德国音乐界的年度盛事——德国联邦音乐工业协会(BVMI)颁发“回声”(Echo)奖，其中嘻哈乐奖项颁给了年轻歌手高里加(Kollegah)和邦(Farid Bang)。但是，这件文艺盛事却成为德国文化界乃至社会和政治舆论中罕见的丑闻。丑闻缘起于两位歌手的获奖专辑“年轻，暴力，高颜值 3”中部分章节的歌词引发了强烈争议，如“我的身体比奥斯维辛的犯人还坚定”“再来一次大屠犹，带着燃烧瓶来”，等等。在颁奖仪式现场，获奖者就已经与其他音乐人发生了言语冲突，颁奖结束后，多名曾经获得“回声”奖的音乐家纷纷退回自己所获的奖杯，表达自己对于带有反犹色彩的音乐作品获奖的抗议。这一事件迅速从文化上升到政治层面，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马上表明了态度：“反犹的挑衅不应该获奖，而是令人作呕”，“在犹太大屠杀纪念日颁发这样一个奖项是可耻的”。4 月 12 日是以色列纪念六百万犹太大屠杀死难者的日子。

在德国社会主流声音一致谴责下，两位引发争议的嘻哈歌手不仅失去了与唱片公司的合同，德国联邦音乐工业协会也宣布终止在世界第三大音乐市场上具有悠久历史的“回声”奖：这个重要奖项的名誉在这一事件中严重受损，必须重新开始。

在文艺剧场中爆发丑闻的同时，普通的街头暴力更令德国公众吃惊：4 月 17 日晚，在柏林时尚而中产的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街头，两名戴着犹太小圆帽的年轻人受到了三个路人的侮辱和攻击，一名施暴者并且手执皮带抽打受害者，口中用阿拉伯语喊着“犹太人”。这一事件被另一位受害者用手机录像后上传到网上。18 日，受害者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他实际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在阿拉伯家庭长大的以色列人。他之所以戴着犹太小圆帽出门，是因为他听说在德国戴犹太小圆帽不安全，所以他想亲身体会一下。显然，德国对于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度。

出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德国政界在第一时间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反应。默克尔总理称：“我们必须赢得对反犹骚乱的战斗”，在德国人和阿拉伯裔居民中都存在反犹言行，“对此必须采取最严厉最坚定的措施”。司法部长巴莉(Katarina Barley)称这一事件为“我们国家的耻辱”。4 月 25 日，数千名德国民众在柏林、科隆、埃尔福特、玛格德堡、波茨坦等多个城市走上街头，举行

集会和游行，其中柏林的集会口号是“柏林戴犹太小圆帽”，抗议反犹言行，表达了德国社会对于文化和宗教宽容的支持。

“回声”奖丑闻和柏林街头的暴力事件，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与成年人的反犹言行相比，德国中小学近期暴露出来的问题可能更令人震惊。据媒体报道，去年3月，柏林市一所中学里一位14岁的英国裔犹太学生不得不更换学校，因为他之前几个月内受到其他学生的辱骂和殴打；去年12月，柏林另一所中学的一名犹太学生不得不忍受其他同学的骂骂：他是“儿童刽子手”，“希特勒是好人，因为他灭绝了犹太人”，等等。据中小学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反映，“你这个犹太人”已经成为德国中小学常见的骂人用语。实际上，很多学校出于名誉考虑，并不愿公开讨论此类问题。对于从建国起就把支持犹太人和以色列作为国家意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无论是引发“回声”奖丑闻的嘻哈乐手，还是柏林街头的暴徒，以及柏林市出口和动手凌辱犹太同学的中小學生——甚至包括女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阿拉伯裔或伊斯兰信仰群体的族裔和文化背景，这与德国固有的极右翼和种族意识形态的反犹有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些事件表明，德国有了一个新生的、外来的、非德意志的反犹问题。

德国社会在战后通过立法、教育、政治和社会工作逐渐形成了一种纠正历史偏执的历史观，彻底否定了引发空前人道灾难的种族意识形态——主要是反犹思想。然而随着中东和近东地区移民的到来，尤其是近年大量难民的涌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政治冲突在阿拉伯群体中引发的另一种反犹言行，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今年3月，德国联邦议院反犹问题独立专家组委托进行了一项针对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的调查，共有25名难民接收了问卷调查，不限性别，年龄跨度为16至53岁。结果表明，这些人多数对犹太人持有偏见：犹太人有钱有势，在世界上四处发动战争。对于二战时纳粹的屠犹行为，他们所知甚少。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固定成形的反犹观点，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对与犹太人打交道有正面的经历。伊斯兰女学者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卡多尔（Lamy Kaddor）沮丧地说，穆斯林反犹主义是一种令人悲伤的现实存在。

尽管如此，联邦议院反犹问题独立专家组成员切尔尼夫斯基（Marina Chernivsky）并不认为新出现的反犹现象应该被简单地归于某个文化或族裔群体。“我们不应该把这场讨论局限于穆斯林，反犹问题涉及我们所有人。”她认为，反犹思想在德国社会依旧有很深的基础，而且不限政治信仰和社会群体。虽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群体特征”，但是如果把某一个群体定性为反犹，那么这就可能会成为社会整体逃避自我反思的托词。

对反犹言行、思想和意识形态保持警惕、进行反省，看来对于德国社会不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对于基础教育领域而言，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8年4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